

机制与记忆：《当代英雄》艺术构造的东正教解读

Mechanism and Memory: An Orthodox Interpretation of the Art Structure of *A Hero of Our Time*

秦彩虹 (Qin Caihong) 张 杰 (Zhang Jie)

内容摘要：19 世纪俄罗斯作家莱蒙托夫的代表作《当代英雄》是我国俄罗斯文学研究界关注的重要作品之一。长期以来，学界主要关注的是文本反映的社会历史生活以及如何反映的机制，几乎很少关注作家的遗传基因、个人情结以及意义再生机制本身的历史文化烙印。其实，《当代英雄》的意义再生机制是由作家的创作个性、东正教精神与 19 世纪上半期历史文化的影响所决定的，具体表现为“个性”与“精神”相融合的“三位一体”的艺术形象塑造、“善恶”与“救赎”融于一体的“神人合一”的艺术表现方式以及“宿命”与“自由”矛盾交织的“体验式的叙述结构”。

关键词：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东正教

作者简介：秦彩虹，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俄罗斯文学。张杰（通讯作者），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江苏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主要从事符号学、比较文学、俄罗斯文学与文论等方面研究。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东正教与俄罗斯文学研究”（项目编号：15ZDB092）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Mechanism and memory: An Orthodox Interpretation of the Art Structure of *A Hero of Our Time*

Abstract: *A Hero of Our Time*, a masterpiece of Russian writer Lermontov,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works studied by Chinese researchers on Russian literature in the 19th century. For a long time, the academic circles mainly focus on the social and historical life reflected by its text and the mechanism of such reflection, while littl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writer's genes, personal complex, and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imprint of the meaning regeneration mechanism itself. In fact, the meaning regeneration mechanism of *A Hero of Our Time* is determined by the writer's personality in composition, the spirit of the Orthodox Church and

the influence of historical culture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 It shows itself with the “Triune” creation of artistic images in which “individuality” and “spirit” are mixed, the artistic expression revealing “the unity of God and man” in which the “good and evil” and “salvation” are combined, and the “experiential narrative structure” in which the “fate” and “freedom” are intertwined paradoxically.

Key words: Lermontov; *A Hero of Our Time*; Orthodox Church

Authors: **Qin Caihong** is Postgraduate Candidate at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China). Her current academic research mainly focuses on russian literature. Email: qchong1026@163.com. **Zhang Jie** is Professor and Ph.D. Supervisor at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and Cultures,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China). And he is also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at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221116, China). His main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semiotic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Russian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theory (Email: z-jie1016@hotmail.com).

文学创作不只是对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文学文本的经典性更是显现于其超越生活的现实性之中。文学文本是由一个独特的意义再生机制所构成的，可以随着不同时代读者的阅读，不断地创造出各种意义。19 世纪俄罗斯著名作家米哈伊尔·尤里耶维奇·莱蒙托夫（Михаил Юрьевич Лермонтов, 1814–1841）的代表作《当代英雄》（*Герой нашего времени*, 1840）虽然已经历了 180 多年的不断接受，但是各种阐释依然从逆向丰富着莱蒙托夫的创作。然而，我国俄罗斯文学研究界主要关注的是文本反映的社会历史生活以及如何反映的机制，几乎很少关注作家的遗传基因、个人情结以及意义再生机制本身的历史文化烙印。其实，不同文学文本的意义再生机制不可能不打上时代的烙印，不留下历史的记忆，而且必然会与作家的个性、民族的信仰相关，也许这才是文学经典的独特性所在。《当代英雄》的意义再生机制是由作家的创作个性、东正教精神与 19 世纪上半期历史文化的影响所决定的。

著名符号学家尤里·米哈伊洛维奇·洛特曼（Юр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Лотман, 1922–1993）曾经指出：“文本作为意义的发生器是一种思维机制。要使这个机制发生作用，需要一个谈话者。在这里深刻地反映出意识的对话性质。要使机制积极运行，意识需要意识，文本需要文本，文化需要文化”（康澄 114）。长篇小说《当代英雄》的意义再生机制是由多个互为对应的层面交织而成的，这里既有个性与精神相互融合的、“三位一体”的艺术同一，也有善恶交织以救赎为旨归的、人神合一的形象塑造，更有宿命与自由互为映射的、体验式的叙述结构等等。这一烙有历史文化印记的意义再生机制，在社会时代、创作个性与俄罗斯东正教信仰的交织中，以其独特的艺术审美形式承载和传播着一定的社会文化信息，为读者展示了无限可阐释的阅读空间。

其实,经典的文学文本和审美形象传承的艺术魅力,正是源于承载着时代社会、作家个性和宗教信仰等特征的文本内在构造和机制。这一机制可以在读者的审美欣赏过程中,不仅能够感知时代的特征、创作个性和民族的精神,更能够不断地从文本中解读出新的意义。本文努力从东正教文化批评的视角,结合作家的遗传基因、个人情结,社会环境,深入剖析长篇小说《当代英雄》及其主人公毕巧林的形象,发掘其意义再生机制的历史文化特征,并揭示其不断滋生新的意义的审美功能。

一、个性与精神:三位一体的艺术同一

长篇小说《当代英雄》自出版以来,一直受到文学批评界的普遍关注,虽然各种评论众说纷纭,但大多数都是从现实和理性层面上加以分析的。我国俄罗斯文学研究界一般认为,19世纪俄罗斯著名作家莱蒙托夫的这部代表作至少在社会和心理两个层面,历史地记载了时代的变迁与心灵的反思,塑造了主人公毕巧林的艺术形象,深刻揭示了19世纪三十年代优秀贵族思想和情感上的悲剧历程。因此,“在俄罗斯文学史中,毕巧林被称为继奥涅金之后的第二个‘多余人’”(曹靖华193)。这是一个既对现实不满,渴望有所作为,但又不知如何发泄自己超人的精力,无所事事,一身毛病的人物。

确实,当代读者在阅读小说《当代英雄》时,均会感觉到毕巧林的冷血、自私,甚至残酷。虽然维萨里昂·格里戈里耶维奇·别林斯基(Виссарион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Белинский, 1811—1848)曾经把毕巧林视为是现实中的莱蒙托夫,“毕巧林,这是他现实中的自己”(转引自邦达连科309),但是当代俄罗斯莱蒙托夫传记作者弗拉基米尔·格里高利耶维奇·邦达连科(Владимир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Бондаренко)在《天才的陨落——莱蒙托夫传》(*The Fall of Genius—Lermontov*, 2016)中,直接表明,莱蒙托夫在毕巧林身上“夸大了自身的缺陷”(邦达连科340)。在长篇小说《当代英雄》第二版的序言中,作家莱蒙托夫也曾明确写道:作者的目的是“揭示我们一代人的‘缺点’”(转引自舍斯托夫8)。然而,在序言的最后,莱蒙托夫却出乎意料地表示,缺点和病症被揭露了,“但怎样医治——这只有天晓得了”(转引自舍斯托夫8)。

究竟应该如何理解莱蒙托夫这种对待主人公的态度呢?这种似乎违背逻辑的言论,弃缺点和病症于完全不顾,已经很难从现实和社会层面来阐释了。也许,从只有从东正教文化批评的视角加以解读,才能够发掘其内在的深刻缘由,揭示《当代英雄》文本意义再生机制的独特性。

白银时代俄罗斯宗教文化批评理论家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布尔加科夫(Серге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Булгаков, 1891—1940)在《哲学的悲剧》一书中,就曾经把艺术形象视为是精神与个性的同一,而精神也只有通过存在(艺术形象)才能够与个性同一。布尔加科夫在书中积极阐释了东正教三位一体的

教义，并且赋予了三位一体以新的内涵。他在人类语言表述的句子中，找到了阐释三位一体的典型例句，即“我是某物”（布尔加科夫 391）这里包含着主语、谓语和系词。系词就是表现个性与精神同一的艺术形象，在《当代英雄》中就是主人公毕巧林。

可以说，从古至今对俄罗斯人的思想有着决定性影响的理论是“现实是理性所不能认识的，只有通过神秘的直觉才能得到认识”（金亚娜等 1）。如果直觉感观主人公毕巧林的行为举止和小说的整个故事情节，其实这位在彼得堡长大的贵族青年军官，几乎所有的行为都是凭借着本能的冲动在进行，他一直是处在本能与精神的复杂矛盾纠葛之中。无论是主人公薄情间接导致的贝拉惨死，还是他路过塔曼小城并受好奇心驱使，打破了走私贩子的生活，自己也差点被抛入大海淹死，或者是玩世不恭地在矿泉玩弄梅丽的情感，与人进行决斗，都是人的各种本能的充分显现。这里最直接呈现的是情欲本能的充分暴露，正是它的使然，美丽的契尔克斯姑娘贝拉被杀死。此外，猎奇和争强好胜的本能又促使他成为破坏者，甚至杀人的凶手，等等。显然，莱蒙托夫展现在读者眼前的是一种本能行为的直觉感观，而在这种直觉体验中，读者又可以见出主人公的个性，隐约感触到主人公的崇高的精神追求。这位禀赋非凡、精力旺盛、聪明过人的贵族青年军官具有先进的思想，与当时的上流社会格格不入，曾怀有崇高的理想与抱负，渴望像拜伦和亚历山大大帝那样有一个辉煌的人生。他甚至羡慕十二月党人能够有机会为人类的幸福做出巨大的牺牲。

莱蒙托夫在《当代英雄》的创作中，似乎是有意识地通过主人公毕巧林这一直觉形象的展示，让个性与精神、本能与信仰同一，使得它们之间形成互文，让艺术表现的现实生活鲜活地存在起来，促使文本意义在读者的解读中不断再生。也许本能就是生命冲动的本源，直觉是美的形象显现，哪怕与社会现实和伦理道德相悖，却更能够让读者感触到精神（上帝）的存在。显然，这种本能的直觉展示是超越社会现实的，更是无需医治的，甚至是值得肯定和赞扬的。

显然，《当代英雄》的意义再生机制又不可能不烙有历史的印记，留下文化的记忆。这种历史的烙印首先是与作家本人的个性特征密切相关的，毕巧林形象作为本能与精神相融合的直觉艺术表现，恰恰是莱蒙托夫的孤傲和桀骜不驯个性的产物。年轻有为的诗人和作家莱蒙托夫直至去世时还不满 27 岁，难道他仅仅凭借自己足够的生活体验和现实经历，就能够创作出如此经典的传世之作吗？其实，除了现实生活的阅历以外，这还是与莱蒙托夫由父亲家族遗传而来的“苏格兰基因”息息相关的。

以往，我国俄罗斯文学批评界，主要是从环境决定意识的视角来分析莱蒙托夫的创作艺术。鉴于莱蒙托夫自幼丧母，外祖母独自将其抚养长大，甚至作家的名字米哈伊尔的由来，也是为了纪念其姥爷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

奇·阿尔谢尼耶夫（Михаил Васильевич Арсеньев 1768—1810），学界更主要地分析外祖母对作家创作个性的影响。然而，诗人的父亲却很少引起研究的关注，这位在岳母的威逼下不得不离开自己儿子的退役军官，实际上是来自更为古老和显赫的苏格兰莱蒙特氏族，源自于乔治·戈登·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 1788—1824）拜伦远房亲戚苏格兰骑士莱蒙特——苏格兰后裔。从诗人的遗传基因来说，莱蒙托夫和拜伦都拥有着“苏格兰基因”，他们之间的性格都包含着“苏格兰基因”里与身俱来的孤傲，孤独与孤僻。莱蒙托夫的传记作家邦达连科曾经明确指出：“通过玛尔加列特·莱蒙特将来自母系的血统和性格给了拜伦，而来自父系的，则由乔治·莱蒙特给了莱蒙托夫。莱蒙托夫对待乔治·拜伦如同对待自己的兄长”（邦达连科 40）。

我国俄罗斯文学研究界已经关注到拜伦创作对莱蒙托夫的影响，甚至在《俄罗斯文艺》上发表了论文“俄罗斯学界关于拜伦对莱蒙托夫的影响问题研究综述”（2013 年第 2 期）。不少学者在莱蒙托夫出版的诗册中发现，作家对拜伦诗歌的翻译和模仿，甚至曾试图对拜伦的《异教徒》和《拉腊》进行翻译。然而，几乎所有的批评家都是从外部来揭示这种影响，很少有人关注到内在的苏格兰基因所产生的重要作用。尽管莱蒙托夫不可能意识到自己与拜伦的遗传基因联系和血缘关系，但是在他的创作中，读者可以隐约感受到拜伦的影子。诗人自己就曾经在诗歌中表示：“我多么想把拜伦赶上”（转引自邦达连科 40）。外部环境对诗人莱蒙托夫的影响只有 10 多年，而遗传基因的作用却是数百年，也许更长的时间。前者是外因，而后者则是内因。

其实，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Фёд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Достоевский, 1821—1881）就明确意识到莱蒙托夫对拜伦的无意识继承，他曾指出：“莱蒙托夫当然是一位拜伦主义者，但他那伟大的、独具一格的艺术力量使他成为一个特殊的拜伦主义者，一个有点爱嘲弄人的、任性的、鄙夷一切、竟然连自己的灵感、自己的拜伦主义都从来不相信的人”（946）。显然，这里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的对“自己的拜伦主义不相信”，指的就是并非有意识的模仿，而是有一种潜在因素的影响，连莱蒙托夫本人都不知道的基因在起作用，即苏格兰基因。这一苏格兰基因在外祖母过分执拗偏爱的作用下，培育着莱蒙托夫孤傲的品性。外祖母不择手段，甚至以法律条文形式威胁阻止诗人与其父亲的交往，完全将诗人禁锢在自己的身边，不允许诗人结婚，以免被别的女人抢走心爱的外孙。

无论文学批评界怎样评价《当代英雄》主人公毕巧林与作者莱蒙托夫之间的联系，几乎都不会否认他们在性格上共有的孤傲特征。从美学意义上来看，也许正是这种孤傲为艺术形象增添了美感和审美欣赏的价值。著名德国心理学家雨果·闵斯特伯格（Hugo Munsterberg, 1863—1916）就曾经在《基础与应用心理学》（*Basic and Applied Psychology*, 2010）一书中指出：“美感与我们的实际生活没有关系，我们和小说或戏剧里面的人物不会产生任何人际

关系；我们是艺术中所展现的生活的旁观者，我们与这些生活没有利害关系”（250）。这也许就是孤立美学的原理，人物性格越是孤立的存在，就越会给读者更多的审美获得感。显然，这种孤傲的“个人行为”又是与精神的“标准行为”共存于同一个体心灵之中（闵斯特伯格 189）。这里的主体（个人行为）包括作家莱蒙托夫自身的孤傲性格以及他自身对社会生活的体验，客体（标准行为）则主要就是东正教教义、文化精神以及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小说的主人公毕巧林就是这两者间的联系，让他们“在起来”了。这“三位一体”便构成了一个审美共同体，即小说《当代英雄》的审美意义再生机制，为读者能够不断发掘文本或形象的可阐释空间，提供了可能。这一审美意义再生机制的第一个历史记忆便是作家的创作个性和遗传基因——苏格兰基因。

二、善恶与救赎：人神合一的形象塑造

任何民族的经典文学文本和艺术形象又不可能仅仅局限于作家自身的创作个性和遗传基因，而更主要的是一种民族精神的历史传承和对创作时代社会历史文化的记忆与超越，莱蒙托夫的小说《当代英雄》的主人公毕巧林自然也不例外。从小说的情节上来看，毕巧林无疑是一个冷漠、自私、任意玩弄女性的、可怕的“恶魔”形象。甚至可以说，他是一个在欲望驱使之下，任意妄为的利己主义者。毕巧林曾经这样描述自己：“我的灵魂已被尘世糟蹋，我的思想骚乱不安，我的心永远不知足。什么事情都不能使我满足，我对悲伤就象对欢乐一样容易习惯，我的生活一天比一天空虚……”（莱蒙托夫 37）。显然，这既是毕巧林自身对一个“人”的灵魂写真，反映出人性中“恶魔”的一面，同时也是毕巧林深刻的自我反思，自我的救赎意识，又表现出他的“神性”的一面。毕巧林需要经历苦难，通过苦难来进行自己灵魂的救赎。他在俄罗斯文学中是第一个把生命意义追寻至死亡的人。他一方面无所事事，另一方面又总要深刻地反思。

从东正教的角度来看，毕巧林是在通过自己的各种破坏性或曰否定性行为，来呼唤起人性内心最本质最纯真的情感，将人们引入宗教的殿堂，激起读者对宗教的解读与思考。在毕巧林身上，不受传统伦理道德羁绊的本能冲动或曰“恶冲动”，明显伴随着东正教的救赎思想，即弥赛亚意识。毕巧林在整个故事中都刻意离开原本属于自己圈子的上流社会，反而去高加索等边缘地区，这实质上是一种本性的救赎，想要将自己解救出来的自主选择，是“神性”的表现。在五篇相对独立而精炼的故事中，毕巧林实质上始终是作为一个闯入者的身份切入故事中，凭借自己强大的天赋能力与人格魅力在不断地领导、影响、刺激和改变着周围的人。

这种救赎意识与莱蒙托夫的孤傲性格，融合造就了毕巧林孤芳自赏、桀骜不驯、玩世不恭、冒险救赎的性格特征。这样，“恶”与“善”、“人”与“神”就融合在一起，构成了毕巧林这一形象的“魂”。正如尼古拉·别

尔嘉耶夫所说：“人即神又兽，即高贵又卑劣，即自由又奴役，即向上超升又堕落沉沦，即弘扬致爱和牺牲又彰显万般的残忍和无尽自我中心主义”（别尔嘉耶夫 3）。毕巧林苦苦挣扎在这迥然不同的两极之间，时而高贵又时而卑劣，时而神性又时而魔性。这也许就是毕巧林形象的艺术魅力之所在。

在毕巧林性格中“冲动”与“救赎”是通过对“自由”的追求来实现的。别尔嘉耶夫指出：“自由，首先是自由，——这是基督教哲学的灵魂，这为其他任何抽象和唯理论哲学所不能领悟”（Бердяев, *Смысл творчества* 22）。毕巧林无论是追逐情感的满足，还是厌弃得到的爱情，皆是缘于对自由的渴望，前者是为了获得欲望的自由，后者则是为了摆脱社会伦理的羁绊。毕巧林自己曾表白，“不论我怎样热爱一个女人，只要她使我感到我应该跟她结婚——那末，再见吧，爱情……我可以一连二十次把自己的生命甚至名誉孤注一掷，可是决不出卖自己的自由”（莱蒙托夫 137）。当爱情、自由和生命相互冲突之时，毕巧林毅然选择自由，也唯有自由才能给他带来生命的真正价值，克服人性本身所具有的孤独感，从而实现自我和他人的“救赎”。毕巧林形象的意义再生机制就是由追求自由连接的、“人性”与“神性”相融合的艺术构造。

毕巧林这一人神合一的艺术形象构造及其所形成的意义再生机制，也不可能不打上历史文化的烙印，最直接的时代和环境记忆无疑来自作家莱蒙托夫本身，很大部分来自作家的高加索情结。不少文学史中都记载着莱蒙托夫被流放至高加索地区服役，以此来表明沙皇专制对作家的迫害。其实，莱蒙托夫在被流放前就曾经随外祖母去过高加索，那里的风土人情让作家为之感叹。这种大自然天地合一的景象，深刻影响着作家艺术形象塑造的人神合一。邦达连科在《天才的陨落——莱蒙托夫传》中明确写道：“依旧让人惊讶的是，作为山地苏格兰人的后裔，还在长途跋涉到高加索之前，在开始他的军旅生活之前，他就热衷于山民为争取自由而斗争的主题”（127）。高加索远离城市的喧嚣和上流社会的交际，对莱蒙托夫孤傲个性的成长和《当代英雄》主人公毕巧林桀骜不驯性格的创作，都有着不可估量的积极影响。如果说苏格兰基因是遗传赋予莱蒙托夫的天性，那么高加索情结这是后天给予作家的恩惠。这两种因素都对莱蒙托夫的性格和创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然而，自然环境的作用又是与社会环境息息相关的，有时甚至水乳交融，难以区分。19 世纪俄罗斯社会的独特历史文化环境，也是小说《当代英雄》及其主人公艺术构造生成的重要因素。这种最为直接的关联，无疑就是 19 世纪俄罗斯社会的东正教文明，可以说东正教造就了 19 世纪俄罗斯文学的灵魂。

19 世纪的欧洲文学是以批判现实主义为主潮的，即通过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命运来看待文学或者社会的发展，通常情况下一位优秀的人物，例如“多余人”悲惨的命运，是由环境造成的，此时作品往往通过人物苦难的经历、悲惨的命运来批判现实环境，这也是批判现实主义力量之所在。然

而, 19 世纪俄罗斯文学明显不同于欧洲现实主义文学, 在普希金之后, 俄罗斯文学走上了另一条“救赎”的宗教之路。东正教不同于天主教、新教等, 不再认为上帝是外在的, 而认为上帝是内在于“自我”的。正如别尔嘉耶夫所说, 俄罗斯文学“探索真理, 并教示实现真理。俄罗斯文学不是产生于个人和人民的痛苦和多灾多难的命运, 而是产生于对拯救全人类的探索。这就意味着俄国文学的基本主题是宗教的”(Бердяев, *Истоки и смысл русского коммунизма* 8)。

因此, 在毕巧林这个“人神合一”的艺术形象身上, 既有来自作家本人的遗传基因和爱好天性, 更留有 19 世纪东正教文明与俄罗斯文学交融的历史文化印记。

三、宿命与自由：体验式的叙述结构

在小说《当代英雄》的创作中, 意义再生机制不仅表现在毕巧林形象的艺术构造上, 而且还体现在小说体裁的形式结构中。从渊源上来看, 《当代英雄》的五篇故事情节大都来自于俄罗斯文学经典和西欧文明的影响, 例如《贝拉》中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源自于西欧文明人与野蛮女的浪漫爱情下的浪漫主义体裁, 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式小人物性质源于普希金的《驿站长》, 而几个故事汇集在一起也借鉴了普希金的《别尔金小说集》等(参见顾蕴璞 78)。

然而, 《当代英雄》的叙述结构又明显受到 19 世纪俄罗斯社会历史环境和东正教思想的影响, 存有鲜明的时代历史文化烙印。19 世纪三十年代, 经过十二月党人起义洗礼的俄国进步贵族青年的孤傲、忧郁和反叛精神, 深深感染了青年莱蒙托夫, 并且与作家心灵痛苦的悲观绝望情绪、火一般的叛逆激情融化在一起。这也使得小说《当代英雄》的现实主义创作, 散发出积极的浪漫主义气息, 促使莱蒙托夫将叙事体小说、日记体以及自由体小说相互融合、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 并且在叙事机制中融合了抒情手法以及内心独白等。小说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内心体验式的叙述结构。

莱蒙托夫并没有按照故事情节发生的时间先后顺序来结构整部小说, 而是由客观的故事叙述、到人物的观察和体验以及主人公自我解剖的递进深入来设计的, 从而形成整部小说的体验式叙述结构。在第一篇《贝拉》中, 首先“我”作为听众, 此时毕巧林是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叙述的主体, 是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口述的爱情故事中外构建的一个形象, 其中穿插着马克西姆·马克西维奇本人的看法和“我”客观的感受。小说的叙述基本上是客观的, 读者读到的仅仅是一个主人公毕巧林与贝拉之间的爱情悲剧故事。在第二篇《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中, 整篇都在描述“我”眼中真实的毕巧林, 包括他的外貌、气质、形象都有一个非常深入的刻画, 当然其中也渗透着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的情感抒发, 以及他与毕巧林之间微妙的关系,

从而丰富了文中“我”眼中毕巧林的形象构建。尽管以上两篇均是通过叙事主体从外部来构建毕巧林的形象，但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递进关系，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由一开始外部人员口中描述的对象过渡到亲身接触“毕巧林”形象。随后的三篇《塔曼》、《美丽公爵小姐》和《宿命论者》均是毕巧林的日记，是主人公对自我心灵的解剖。莱蒙托夫直接以日记体的形式直触毕巧林的内心深处，通过他本人内心的对话与独白，让他自我剖析，自我反思。这种逐渐走向主人公的心灵深处，形成一个由浅入深的自我心灵探索，从而展示主人公性格特征的写法，不能不说是 19 世纪上半期俄罗斯社会对作家的巨大影响所导致的。

同时，小说《当代英雄》的这种体验式艺术构造，除了社会时代的历史缘由，又是与东正教对作家本人的影响密不可分的。这主要是源于东正教的弥赛亚意识，即以救赎为核心的自我或他人的拯救意识。读者不难发现，小说《当代英雄》的主人公毕巧林身上几乎时时刻刻都体现出这种救赎的思想。当然，毕巧林的自我救赎往往处于矛盾和痛苦之中，他一方面千方百计地追求自我和他人的自由，另一方面又感叹命运的不可抗拒，即宿命。具体在小说中，毕巧林既渴望爱情的自由，但又惧怕陷入爱情不可自拔，既不满足于现有的生活，不断地追求新的生活，探寻生命的意义，却又无法摆脱命运的羁绊。他在自己的人生旅程中，时而热情，时而又冷漠和残酷，时而孤傲，时而又渴望友情和认同，时而游戏人生，时而又自责和反省，时而酷爱生命，时而又自毁和玩命，时而理性聪慧，时而又非理性的感情用事，时而潇洒人生，时而又无法摆脱世俗的束缚。总之，在“自由”和“宿命”之间，毕巧林奋力挣扎和拼搏，其内驱力就是以救赎为目的的东正教弥赛亚意识。

显而易见，19 世纪上半期的社会历史时代背景与俄罗斯东正教的文化精神相互作用，形成了莱蒙托夫小说《当代英雄》的文本意义再生机制，并且使得这一机制烙上了历史文化的记忆。这一机制与文化记忆具体表现为，“个性”与“精神”相融合的“三位一体”的艺术形象塑造、“善恶”与“救赎”融于一体的“神人合一”的艺术表现方式以及“宿命”与“自由”矛盾交织的“体验式的叙述结构”。莱蒙托夫小说《当代英雄》艺术结构的东正教解读，可以为我们从宗教的视角重读经典文本，提供有价值的阐释途径。

【 Works cited 】

Бердяев, 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Смысл творчества*.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а «Искусства», 1989.

Бердяев, 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Истоки и смысл русского коммунизма*.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а «Наука», 1990.

弗拉基米尔·格里高利耶维奇·邦达连科：《天才的陨落——莱蒙托夫传》，王立业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6 年。

- [Bondarenko, Vladimir Gregarievich. *The Fall of Genius—Lermontov*. Trans. Wang Liye. Beijing: New Star Press, 2016.]
- 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布尔加科夫：《哲学的悲剧》，载《布尔加科夫文集》（第1卷）。莫斯科：思想出版社，1993年。
- [Bulgakov, Sergei Nikolayevich. *Philosophical Tragedy, Bulgakov Corpus*. Vol. 1. Moscow: Thoughts of press, 1993.]
- 尼古拉·别尔嘉耶夫：《人的奴役与自由》，徐黎明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
- [Berdyaev, Nikolai. *Human Bondage and Freedom*. Trans. Xuliming. Guiyang: Guizhou people's press, 1994.]
- 曹靖华主编：《俄苏文学史》（第1卷）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
- [Cao Jinghua, ed. *Literary History of Russia and Soviet Union*. Vol. 1. Zhengzhou: Henan Education Press, 1992.]
- 顾蕴璞：《莱蒙托夫研究——纪念伟大诗人诞生200周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 [Gu Yunpu. *The Study of Lermontov — Commemorate the Birth of a Great Poet 200th Anniversary*. Beijing: Peking UP, 2014.]
- 金亚娜等：《充盈的虚无——俄罗斯文学中的宗教意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
- [Jin Yana, ed. *The Emptiness of Fullness—Religious Consciousness in Russian Literature*.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03.]
- 雨果·闵斯特伯格：《基础与应用心理学》，邵志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 [Munsterberg, Hugo. *Basic and Applied Psychology*. Trans. Shao Zhifang. Beijing: Peking UP, 2010.]
- 康澄：《文化及其生存与发展的空间——洛特曼文化符号学理论研究》。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2006年。
- [Kang Cheng. *Culture and the Space for Its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A Study of Lotman's Cultural Semiotic Theory*. Nanjing: Hohai UP, 2006.]
- 米哈伊尔·莱蒙托夫：《当代英雄》，草樱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
- [Lermontov, Mikhail. *A Hero of Our Time*. Trans. Cao Ying.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1978.]
- 列夫·舍斯托夫：《悲剧的哲学——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尼采》，张杰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92年。
- [Shestov, Lev. *The Philosophy of Tragedy—Dostoevsky and Nietzsche*. Trans. Zhang Jie. Guilin: Lijiang Publishing House, 1992.]
- 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家日记》（下），张羽、张有福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
- [Dostoevsky, Fyodor. *Diary of a Writer*. Vol. 2. Trans. Zhang Yu and Zhang Youfu. Shijiazhuang: Hebei Education Press, 2009.]

责任编辑：张连桥